

文心雕龍新探

張少康著

卷之三

忌也夫和欲其
風雅之初如此

粉滿錫毫元你
惟益福壽永春
你亦贊辭改

不有屈原。豈見離騷。驚才風逸。壯志煙高。山川無極。情理實勞。金相玉式。豔溢錙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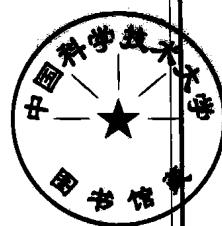
贊曰

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苑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豔辭。
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若能憑誠以
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真。觀華而
不墜其實。則顧盼可以驅辭力。欬唾可以窮文致。
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若能憑誠以
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真。觀華而
不墜其實。則顧盼可以驅辭力。欬唾可以窮文致。
亦不復乞靈於長卿。假寵於子淵矣。

鼈而深華。卜居標放言之志。漁父寄獨往之才。故
故重圓之皮。日休評詩辭。無古易之玄。以易
相表裏。子捐形。而深當抱隱。始之玄。相表裏。謂
秀而古韻。王褒作。九懷以下。遠躡其跡。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
敘情怨。則鬱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快而難懷。論
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侯。則披文而見時。是以
故賈追風。以入麗馬。揚洽波而得奇。其衣被詞人。
曹植始曰山水。吳詒真之也。若橫拔文而見時。未

之英傑也。觀其骨鯁所樹、肌膚所樹，雖取鎔經意，亦自鑄偉辭。故騷經九章，朗麗以哀志；九辨宋玉作《辯賦》，又作《辯賦》，綺靡以傷情。遠遊天問，壞詭而惠巧。招鬼招隱，耀

張少康著



文史哲學集成

文心雕龍新探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文心雕龍新探／張少康著 -- 初版。-- 臺北市
：文史哲，民 80
3,286 面；21 公分（文史哲學集成；232）

ISBN 957-547-012-5 (平裝) NT\$ 240.00

1. 文心雕龍 - 批評，解釋等

820

80001448

文心雕龍新探

著者：張少康
出版者：文史哲出版社
發行人：彭正雄
發行所：文史哲出版社
印刷者：文史哲出版社
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七十二巷四號
郵政劃撥帳戶一六一八〇一七五號
電話：八八六一—三五一一〇二八

實價新台幣二八〇元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六月初版二刷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ISBN 957-547-012-5

序

「五四」運動以後，我國學術界在西方文藝思潮的影響下，對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的研究，頗為重視。從本世紀的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陸續出版了幾種很有份量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專著。在古文論巨著《文心雕龍》的研究方面，也出現了黃侃《文心雕龍札記》、范文瀾《文心雕龍注》、劉永濟《文心雕龍校釋》等幾種功力頗深的著作。建國以後，古文論的研究有進一步的開展。大家認識到，運用新的觀點方法，整理研究中國古代的文學理論批評，不但對於閱讀欣賞古代文學作品、借鑒古代作家的創作經驗，很有裨益；同時對建立民族化的文學理論體系，尤為必要。在這種認識的指導下，古文論的研究日趨繁榮，《文心雕龍》尤為人所注目，僅新的全注本（有的還附有白話譯文）就有四五種，專門研究著作有十多種，單篇論文更是不勝枚舉。在當前學術研究領域，《文心雕龍》的研究已經成爲一門顯學，以至出現了「龍學」這一名稱。在已出的多種專著中，有些是頗有深度的。像楊明照先生的《文心雕龍校注拾遺》，校釋字句，考核精確，繼承了清代樸學的優良傳統；王元化先生的《文心雕龍創作論》，把《文心雕龍》中關於創作的理論與西方文論進行比較分析，見解新穎精闢，打開

了新的研究路子；詹鍇先生的《文心雕龍的風格學》，專門探討《文心雕龍》的風格理論，內容翔實，提供了不少有價值的材料和見解。這些著作，在學術界都已得到重視和好評。

儘管《文心雕龍》研究過去已經取得很大成績，但還有許多工作要做。《文心雕龍》全書內容豐富，涉及面廣，體大思精，它用精緻的駢文寫成，有時語言較為深奧而不易理解，還容易引起歧義；因此，全書中還有許多問題需要進一步探索和討論，一時還不能得出結論。至於劉勰的身世，由於資料不足，不少情況也待繼續考訂。少康先生的這本書，對劉勰身世和《文心雕龍》的理論作了新的探索。他對全書的理論體系和內容作了詳細論述，提出了不少新的看法，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有的看法相當精警而富有啟發性。對劉勰身世，雖着墨不多，也能獨抒己見。本書對劉勰理論歷史淵源的探討，尤為重視。他在這方面搜集了許多資料，除劉勰以前的文學理論外，廣泛涉及到哲學、歷史、藝術、宗教各個方面，並與劉勰的理論聯繫起來，細致剖析其源流關係。關於劉勰理論的歷史淵源，過去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和研究《文心雕龍》的著作、論文中，也有所涉及，但比較簡單粗略，本書在這方面當做一個重點來研究，作了較多的發掘和開拓，提出了不少可貴的見解，因此顯得特別富有新意和特色。對於劉勰所利用的前人思想資料有較多的瞭解，有助於更準確全面地認識劉勰的思想，並能認識劉勰對前人的理論如何繼承並有所發展，從而更準確地評價他理論的創造性和歷史地位。為了全面透徹地認識劉勰的文學理論內涵，我們應當從各種不同角度，就某些方面進行深入細緻的研討，大家群策群力，分工協作，就能把「龍學」研究更快地推向前进。少康先生在《文心雕龍》理論的歷史

淵源方面作了重點探討，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

要做好中國古代文論的研究工作，一方面要有良好的古漢語和文學史修養，瞭解古文論的確切涵義，認識古代文論是如何總結古人的創作經驗並反過來指導創作；另一方面要有較高的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水平，用它作武器來剖析、評價古代文論。少康先生過去研治文藝理論多年，具有較好的理論素養，同時對中國古代的語言文字、文學創作以及哲學、歷史等現象都頗為重視，認真鑽研。他近年來出版的《中國古代文學創作論》、《文賦集釋》兩書，顯示出他在以上兩方面都有較深的功力。現在又有這本具有深度和特色的新著問世，對於他的治學勤奮，精進不已的精神，我是很欽佩的。因作此短文，表達我的欽佩贊賞的心情。

王運熙

一九八六年一月

文心雕龍新探 目次

序	王運熙	一
前言		
臺、劉勰的生平和思想淵源		二
貳、《文心雕龍》的文學理論體系及其思想淵源		三
一、原道論——論文學的本質與起源		二二
二、神思論——論文學的構思與想像		二二二
三、隱秀論——論文學形象的特徵		四二
四、物色論——論文學創作的主觀與客觀		八六
五、體性論——論文學的風格		一〇四
六、風骨論——論文學的精神貌美與物質形式美		一二三
七、通變論——論文學的繼承、借鑒與創新		一四一

- 八、情採論——論文學的內容與形式 一六〇
九、文體論——論文學的體裁與種類 一七五
十、文術論(上)——論文學的寫作技巧：關於結構布局和比喻誇張 一九七
十一、文術論(下)——論文學的寫作技巧：關於聲律、對偶、用典及其他 二一六
十二、時序論——論文學發展與時代的關係 二三二
十三、知音論——論文學的欣賞與批評 二四四
十四、折衷論——論《文心雕龍》的研究方法 二五五
參、《文心雕龍》在中國古代美學和文學理論批評史上的地位 二七一
後記 二八三

前　　言

公元五、六世紀，當歐洲的文藝理論和美學的發展進入黑暗、停滯的中世紀時，在東方却出現了一位具有世界意義的偉大文學理論批評家劉勰。魯迅先生稱劉勰的《文心雕龍》「解析神質，包舉洪緯，開源發流，爲世楷式」（註一），並與西方的亞里斯多德《詩學》相比美，這是並不誇大的。從某種意義上說，《文心雕龍》更有許多超過《詩學》的地方。它顯然比《詩學》有更爲嚴密的理論體系，更加豐富的具體內容。它既是一部文學理論著作、文章學著作，又是一部文學史、各類文章的發展史，而且也是一部重要的古典美學著作。現在，大家把對《文心雕龍》的研究稱爲「龍學」，這是它當之無愧的。

劉勰的文學思想和文學理論既博採衆長，又富於獨創性。我們應該對他的文學理論體系，他在理論發展史上的貢獻，以及他的文學思想的歷史淵源，作一個比較全面、比較深入、比較具體的探討和分析。這是筆者所以要寫這樣一部書的宗旨。然而，要做這樣一件工作，要達到這樣一個目的，是有很多困難的。這主要有以下兩個原因：第一，要對劉勰的文學理論體系本身作出一個符合實際的全面

論述，是不容易的。因為目前學術界對劉勰的文學理論中許多重要問題的看法，尚無基本一致的認識。第二，劉勰學識淵博，他的文學思想涉及的面很廣，接受歷史上的思想資料也特別多，與中國古代許多重要的學術思想、文藝思想有密切關係，要論述劉勰文學理論的歷史貢獻與思想淵源，就要認真研究歷史上許多重要的哲學思想、政治思想、文藝思想、美學思想，而這是非常複雜而困難的問題。從筆者的學識水平來說，確有難以勝任和不自量力之感。然而，路總是要人走出來的，何況在這方面，筆者早已不是拓荒者，許多專家、學者曾從各個方面、各個不同角度，對這一問題作過不少研究。筆者所論可能是不成功的，但是只要能為「龍學」的研究提供一點新的想法，即使是失敗了，也大約還是有意義的。為此，筆者還是願意來大膽地試一試。

【附註】

註一 《論詩題記》

壹、劉勰的生平和思想

劉勰和他的《文心雕龍》正在日益受到國內外學者的重視，然而，有關劉勰的生平和思想的資料，歷史上遺留給我們的確實是太少了。即以劉勰的生卒年而論，目前雖經學者們多方考證和研究，也還沒有一個明確的結論。劉勰的生年一般都是依據對《文心雕龍》成書年代的考訂而推算出來的。因為《文心雕龍·序志》篇中有「齒在逾立，則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於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之語，可見其寫作《文心雕龍》大約在三十歲剛過不久。《文心雕龍》究竟成書於何時，歷來也有不同看法。現存各類《文心雕龍》一般都題「梁劉勰撰」，故也有人認為是成書於梁代。但是大多數學者還是同意清代劉毓崧《通誼堂文集·書文心雕龍後》一文中的意見，認為書當成於南齊末年。劉毓崧的這個看法，論證比較充分，從目前來看仍是不可推翻的。其云：

《文心雕龍》一書，自來皆題梁劉勰著，而其著於何年，則多弗深考。予謂勰雖梁人，而此書之成，則不在梁時，而在南齊之末也。觀於《時序》篇云「暨皇齊馭寶，運集休明，太祖以聖武膺策，世祖以睿文纂業。文帝以貳離含章，高宗以上哲興運，並文明自天，緝退（原注：

『退，疑當作熙。』）景祚。今聖曆方興，文思光被」云云。此篇所述，自唐虞以至劉宋，皆但舉其代名，而特於齊上加一「皇」字，其證一也。魏晉之主，稱謚號而不稱廟號，至齊之四主，惟文帝以身後追尊，止稱為帝，余並稱祖稱宗，其證二也。歷朝君臣之文，有褒有貶，獨於齊則竭力頌美，絕無規過之詞，其證三也。東昏上高宗之廟號，係永泰元年八月事，據「高宗興運」之語，則成書必在是月以後。梁武帝受和帝之禪位，係中興二年四月事，據「皇齊馭寶」之語，則成書必在是月以前。

按永泰元年爲公元四九八年，中興二年爲公元五〇二年，其間相距約四年。劉氏又指出：「所謂『今聖曆方興』者，雖未嘗明有所指，然以史傳核之，當是指和帝而非指東昏也。」劉氏的理由《梁書·劉勰傳》說劉勰《文心雕龍》書成之後，曾欲取定沈約，沈約時正值「貴盛」之際；而沈約的「貴盛」，實自和帝時始。由此推定《文心雕龍》成書當在齊末，大約公元五〇一年至五〇二年之間。劉氏的說說法是可信的。像《文心雕龍》這樣一部「體大思精」之作，劉勰由起草到寫定，當然不可能是一朝一夕之功。但是，以劉勰的才學來看，他決非「覃思之人」，不會像張衡那樣「研《京》以十年」，如左思那樣「練《都》以一紀」，大約有兩、三年也就差不多了。這樣，我們假定他是在南齊永元元年（公元四九九年）開始寫作，到中興元年（公元五〇一年）殺青，恐怕於情理還是符合的。由公元四九九年上推三十年左右，那麼，劉勰的生年大約是在公元四六八年或四六九年，也就是劉宋的明帝泰始四年或五年。范文瀾同志《文心雕龍注》卷十中推定爲公元四六五年（宋明帝泰始元年），我認

爲是稍微早了一些，這是由於范文瀾先生把劉勰開始寫作《文心雕龍》推定在三十三、四歲，又設想其寫作《文心雕龍》一書用了三、四年的緣故。

劉勰的卒年比生年更難考定，因爲《梁書》本傳沒有確切記載，而又無其他有力之旁證材料。《梁書·劉勰傳》涉及到劉勰之死，僅有如下一段記載：

有敕，與慧震沙門於定林寺撰經。證功畢，遂答求出家，先燔髮以自誓。敕許之。乃于寺變服，改名慧地。未期而卒。

從這裏我們可以知道劉勰在出家改名慧地之後，不到一年就去世了。范文瀾同志根據這一段話，認爲撰經一事當在劉勰之師僧祐死後。僧祐死於梁天監十七年（公元五一八年）。范文瀾先生又認爲撰經約一、二年畢功，從而考定劉勰約卒於梁普通二年，即公元五二一年。不過，范文瀾先生這個推測是缺乏說服力的。因爲劉勰與慧震在定林寺撰經一事究竟在何時，史無明言。而慧震之事跡亦無任何材料。僧祐死時，據《梁書·劉勰傳》記載，正在劉勰因陳表而「遷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之時。劉勰當時在仕途上適值春風得意，又深受昭明太子蕭統的寵幸，爲他所「深愛接之」。從劉勰的生平經歷和思想發展來看，不可能在這個時候離開昭明太子蕭統去定林寺撰經，也更不會脫離仕途要求出家。（此點我在下面論述其思想時還要詳談。）李慶甲先生在《劉勰卒年考》（註一）一文中根據南宋釋祖琇的《隆興佛教編年通論》、志磐的《佛祖統記》本覺的《釋氏通鑑》、元代釋念常的《佛祖歷代通載》、覺岸的《釋氏稽古略》等書記載，提出劉勰之去定林寺與慧震等撰經以及要求出家當是在

昭明太子蕭統死後，這一點我認為是有道理的，也是可信的。楊明照先生在《文心雕龍校注拾遺》中也同意這一點。蕭統的死對劉勰在政治上的發展是有很大影響的。這時，曾經提拔過劉勰的臨川王蕭宏、南康王蕭績已先後去世（蕭宏死於梁普通七年，即公元五二六年；蕭績死於梁大通三年，即公元五二九年）。蕭統一死，劉勰在政治上失去依靠，且東宮易主，劉勰自然不可能再在東宮任職。據《梁書·文學傳·劉杳傳》記載，劉杳也是昭明太子的「東宮通事舍人」，「昭明太子薨，新宮建，舊人例無停者，敕特留杳焉。」又《梁書·殷鈞傳》記載，殷鈞曾為昭明太子時的「太子家令，掌東宮書記」，「昭明太子薨，官屬罷。」蕭綱當太子後，他的文學思想與蕭統迥異，就選善寫宮體詩的庾肩吾當了東宮通事舍人。（見《梁書·庾肩吾傳》）這些說明蕭統死後，劉勰在政治上已無大的發展前途，且梁武帝後來與蕭統亦有矛盾，故而，劉勰在這種情況下退出政治舞台，再次入定林寺撰經，並表求出家，是完全合乎情理的事了。無論從客觀形勢或劉勰的主觀思想來說，都是可以理解的。蕭統之死是在梁中大通三年，即公元五三年，劉勰之卒當在是年之後，上距蕭統之死時間不會很長。李慶甲同志謂死於公元五三二年，楊明照先生謂死於五三八或五三九年，不過均尚少確證。但大致地說不會超出這個期間。

關於劉勰的身世，《梁書·劉勰傳》記載也很簡單。在當時的門閥社會裏，劉勰究竟出身於士族還是寒族，學術界也是有爭論的。我基本上同意王元化先生在《文心雕龍創作論》中的意見，劉勰乃是屬於寒族出身的知識分子。這一點從現有的歷史材料來分析，是可以得到明確的結論的。王利器先

生在其《文心雕龍校證》一書的「序錄」中，認為劉勰出身士族，「東莞劉氏，世居京口，實爲過江的僑姓。」他的主要根據是《宋書·劉秀之傳》和《宋書·劉穆之傳》。但是，誠如王元化先生已經指出的，劉穆之雖曾參予宋高祖劉裕的開國大業，死後位列三公，食邑千戶，然而，他本人也是寒族出身。他的直系曾孫，與劉勰並輩的劉祥就直言不諱地承認是寒族出身。《南齊書·劉祥傳》云：「祥少好文學，性韻剛疎，輕言肆行，不避高下。司徒褚淵入朝，以腰扇障日，祥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淵曰：『寒士不遜。』祥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當時的士族既譏祥爲寒士而加以鄙視，劉祥更自以寒士爲高。至於劉勰既非劉穆之直系子孫，自然不可能有擠入士族之奢望。劉秀之是劉穆之的「從兄子」，雖亦爲司空，食邑千戶，然其後代，亦已衰落。而且劉秀之一家的地位顯然不如劉穆之一家。劉穆之的孫子劉瑀對其族叔就很看不起，直呼其爲「黑面阿秀」。（見《宋書·劉穆之傳》）這裏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梁書·劉勰傳》云：「祖靈真，宋司空秀之弟也。」然據《宋書·劉秀之傳》記載，秀之的兄弟有欽之、粹之、恭之等，而未見有靈真之記載，這說明靈真可能沒有做過官，而且也可使人懷疑靈真是否秀之的親弟弟。其名字亦與秀之一輩的習慣不同。可見，劉勰一脈的家庭情況歷來是不佳的。而劉穆之的後代則在政治地位和經濟狀況來說都要比之高得多。像劉勰父一輩的劉數、劉衍、劉瑀等都做過不小的官，與劉勰同輩的劉彪在齊代雖「降爲南康縣侯」，却仍「食邑千戶」，而劉勰一家則顯然是不在他們眼裏的。所以，要說劉勰一家能依靠劉穆之、劉秀之的地位，甚至說是士族出身，那是很難令人相信的，恐怕于實際情況也

是不符的。劉勰的祖先是東莞莒人，由於南北分立而遷居京口，自然也說明其祖先原是有地位的。但是劉勰一系却早已沒落，在政治上沒有什麼發展。他的父親劉尚雖做過越騎校尉，只是一小官，且早死，其事跡亦不可考，到劉勰時更是一蹶不振了。

不過，劉勰在這樣的家庭環境裏長大，從政治上尋求出路，很自然地成爲他青年時代思想的主流，其進願望是十分強烈的。這一點劉勰自己在《文心雕龍·程器》篇中就說得很清楚。其云：

蓋士之登庸，以成務為用。……安有丈夫學文，而不達於政事哉。……是以君子藏器，待時而動，發揮事業，固宜蓄素以弸中，散采以彪外，檢持其質，豫章其幹，摛文必在緯軍國，負重必在任棟梁，窮則獨善以垂文，達則奉時以聘績，若此文人，應梓材之士矣。

這就是他所奉爲圭臬的那種儒家積極進取的態度。然而，在當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門閥社會裏，像劉勰那樣的「寒士」，要在仕途上有所發展，真是談何容易！對此，劉勰是有許多牢騷和不滿的。他在《文心雕龍·程器》篇中還說道：

蓋人稟五材，修短殊用，自非上哲，難以求備。然將相以位隆特達，文士以職卑多謫。此江河所以騰湧，涓流所以寸折者也。名之抑揚，既其然矣；位之通塞，亦有以焉！

魯迅在《摩羅詩力說》中借此數語而批評「東方惡習」，絕不是偶然的。它確實比較充分地表現了封建社會中下層文人的一種帶有普遍性的憤慨情緒。劉勰這種思想與左思在《咏史》詩中所說：「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是完全一致的。

劉勰既然抱定了這樣一種人生處世態度，為什麼又在很年青的時候就進入定林寺「依沙門僧祐」呢？而且「與之居處積十餘年」之久。劉勰入定林寺的時間大約在南齊永明八、九年間（公元四九〇年至四九一年）。因為他是在梁天監初「起家奉朝請」，並於天監三年（公元五〇四年）起任中軍臨川王蕭宏記室，當是在這期間離開僧祐和定林寺。據《高僧傳》記載，定林寺僧超辨死於永明十年（公元四九二年），而劉勰爲之作碑文，僧柔死於延興元年（公元四九四年），劉勰亦爲之作碑文，可知他必於永明十年前進入定林寺。由他「起家奉朝請」時上推「十餘年」，正好是永明八、九年之際。這時劉勰大約二十歲剛過。關於劉勰青年時代入定林寺依沙門僧祐的原因，學術界有兩種代表性的觀點，一說由於家貧，一說由於信佛。但是，我們認真研究這兩種說法，似均未妥。楊明照先生在《文心雕龍校注拾遺》一書中的《梁書劉勰傳箋注》一文中說：

按舍人早孤而能篤志好學，其衣食未至空乏，已可概見。而史猶稱為貧者，蓋以其家道中落，又早喪父，生生所資，大不如昔耳。非以家徒壁立，無以為生也。如謂因家貧，致不能婚娶，則更悖矣。……然則舍人之不婚娶者，必別有故，一言以蔽之，曰信佛。……《高僧傳》卷十一釋僧祐傳：「年十四，家人密為訪婚，祐知而避之定林，投法達法師。達亦戒德精嚴，為法門梁棟。祐師奉竭誠，及年滿具戒，執操堅明。」舍人依居僧祐，既多歷年所，於僧祐避婚為僧之事，豈能無所聞知，未受影響？

楊明照先生雖未明言劉勰因信佛而入定林寺，但既以爲他緣信佛而不婚娶，則依僧祐之原因當亦不言